

重新思考国际分校的相关性

菲利普·G·阿特巴赫、汉斯·德·威特

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汉斯·德·威特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 国际分校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 如今规模尚小, 但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格局重要的一部分。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分校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如《大学世界新闻》 (University World News) 于2019年12月14日发表的“国际分校可以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Branch campuses can widen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一文。我们对此持高度怀疑态度, 并认为国际分校现在并将继续成为中学后教育领域的一小部分, 而且许多学校可能是不可持续的。

2017年的数据显示, 77个国家共有263个国际分校, 这个数字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一倍多。中国取代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为国际分校的第一大主办国。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是赞助国际分校最大的输出国, 俄罗斯和法国是另外的关键参与者。全球大约有22.5万名学生在国际分校学习。这意味着全球2万多所大学中的1%, 全球流动学生的5%, 以及总学生人数的0.1%。在高等教育环境中, 国际分校只是一个小而相关的利基市场,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其他跨境教育项目 (例如特许经营, 衔接计划等) 的研究关注度要高得多, 但它的影响可能更深远, 不确定性也更多。

国际分校的不稳定性

国际分校的生存依赖于一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东道国对其境内的分校拥有主要控制权, 而政治或经济环境或政策的变化、包括质量保证机构在内的各种高等教育机构的决策、学生兴趣的变化或市场的变化都会迅速影响到国际分校。未能达到招生目标可能也会迅速产生问题。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日本, 主要是受到市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邀请, 建立了21多所分校, 其中大部分是鲜为人知的美国大学。他们很快就遇到了与当地政府有关的监管问题, 因此, 加上其他原因他们无法实现入学目标。除了三个分校外, 其他所有的都不见了。新加坡政府也欢迎国际分校,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出于各种原因, 已经关闭了几所分校, 而该地区的其他一些分校, 由于资金、招生和内部政治限制, 被所在机构或其他当局关闭。许多国际分校甚至都没有启动, 比如中国的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的2018年计划。

谁来买单?

尽管关于国际分校融资细节的研究很少 (如果有的话), 但有几件事是相当清楚的。首先, 很少有输出国的大学为他们在主办国

的分校校园或设施买单。在某些情况下，如阿布扎比的纽约大学，校园是由阿布扎比政府建造的。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会提供建筑来吸引国际分校来开发。卡塔尔政府建设教育城是为了吸引9所位于当地的国际分校。许多国际分校都被主办方和承办者期望赚一份利润或至少在提供的教育服务上收支平衡。其他一些则得到东道国当局的大量补贴。最近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国际分校通常要履行为输出国宣传和增强输出国软实力的使命。如果完全承担所有的成本，许多国际分校就不太可能生存下来。而那些试图这样做或没能从东道国或输出国获得支持的分校，往往会失败和破产。

为什么会有国际分校？

建立和维护国际分校的动机是复杂的，对于主办方和承办者来说各不相同（请参见朗布利[Rumbley]和威尔金森[Wilkins]在《国际高等教育》第93期对国际分校的定义）。对主办方，外国大学的分校能带来信誉，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使学生在家就能学到海外的课程，带来新的课程理念、治理、教学、或其他创新，特别是在民办大学中，赚钱。一些地方，例如迪拜、卡塔尔和韩国，视自己为“教育中心”，并试图吸引外国大学设立分校，为当地或区域市场服务，但成效不一。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国际分校为女性提供了在“外国”大学学习的机会，因为这些女性出国旅游的能力较弱。

主办大学也有一系列的目标。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将分支机构视为招募学生到母校学习并建立品牌形象的一种方式。许多人专注于赚取收入。一些国家将国际分校视为发展“软实力”举措的一部分。一些大学将其分支机构视为大学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并

将其视为国际化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当来自国内的学生在该分支机构学习时。纽约大学在阿布扎比和上海的分校为本国学生提供学习机会方面尤其成功。来自潜在东道主的邀请，尤其是与重大投资相结合时，就会很有吸引力。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印度大学在迪拜和加勒比的分校，其目的是服务于外籍社区。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是另一种模式，该校主要由当地华人社区出资，为马来西亚华人学生提供服务。

全部这些国际分校的动机表明了所涉及的许多元素是复杂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目标。

国际分校具有创新性吗？它们的贡献是什么？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国际分校对其所在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做出了很大贡献。它们似乎在自己的环境中运作，反映了办学大学的教学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的教学方法。正如雷恩（Jason E. Lane）和鲍尔（Hans Pohl）在本期《国际高等教育》中指出的那样，除了一些例外，国际分校对研究的贡献非常有限。很少或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有助于改善东道国的高等教育。相反，东道国政府的学术自由和意识形态要求就经常与大学产生紧张关系。

国际分校能否复制其本国大学国际分校理念的一个判断基础是，分支机构应该尽可能多地复制其母校的课程、师资和校风。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会有一种方法或另一种方法。在少数情况下，比如纽约大学在上海和阿布扎比的分校，以及耶鲁大学在新加坡的分校，主办学校一直在努力维持自己的学术标准和学术道德——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卡塔尔学术城的美国